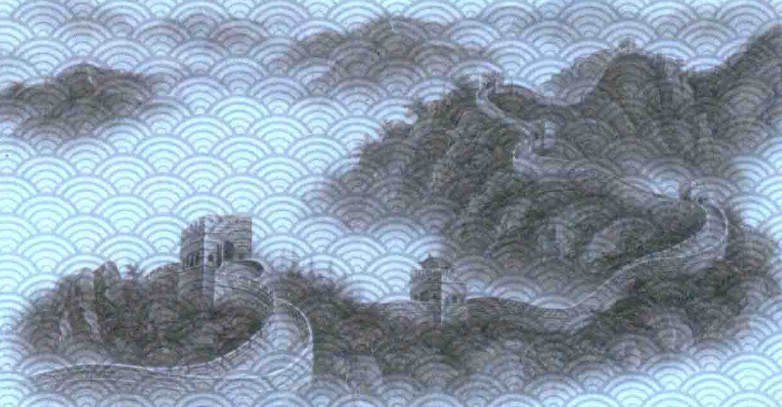


罗英桓◎著

中华文化大智慧

| 善行篇 |



著名文史大家、《曾国藩》作者唐浩明先生题字推荐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中华圣贤言行智慧
修身可读 教学可参 齐家可习 治国可鉴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罗英桓◎著

中华文化大智慧

| 善行篇 |



SPM

南方出版传媒
广东人民出版社

· 广州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文化大智慧. 善行篇/罗英桓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15. 9
ISBN 978 - 7 - 218 - 10284 - 9

I. ①中… II. ①罗… III. ①中国文化 - 研究 IV. ①K2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81317 号

ZHONGHUA WENHUA DA ZHIHUI (SHANXING PIAN)

中华文化大智慧 (善行篇)

罗英桓 著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 版 人: 曾 莹

责任编辑: 李展鹏

装帧设计: 友间文化

责任技编: 周 杰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 10 号 (邮政编码: 510102)

电 话: (020) 83798714 (总编室)

传 真: (020) 83780199

网 址: [http:// www. gdpph. com](http://www.gdpph.com)

印 刷: 广东信源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22.25 字 数: 380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 83795240 83793157

前 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一个民族的魂。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要的是中华文化的复兴，特别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复兴。

五千年来，在华夏大地上孕育的中华民族形成了中华文化，其中以“大道之行，天下为公”、“四海之内皆兄弟”、“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天人合一，义利合一，知行合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利而不害，为而不争”、“损有余而补不足”、“诸恶莫作，众善奉行”、“慈悲喜舍”、“自我克制，自我反省，自我觉悟”等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儒道佛文化），直接影响了中国人，成为人们内化于心的价值理念（如儒家的孝悌、道家的不争、佛家的慈悲）和外化于行的生活方式（如尊老爱幼、守望相助、谦退礼让、扶危济困），并极大地影响了世界。世界著名历史学家、英国史学泰斗汤因比在 20 世纪 70 年代初说：“像今天高度评价中国的重要性，与其说是由于中国在现代史上比较短时期中所取得的成就，毋宁说是由于认识到在这以前两千年期间所建立的功绩和中华民族一直保持下来的美德的缘故。”他盛赞“中华民族培育起来的世界精神和中国儒道佛文化（注：佛教起源于印度，东汉明帝时传入中国后发扬光大）”。（《展望二十一世纪——汤因比与池田大作对话录》第二编“政治与世界”第四章，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5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英国汤因比、日本池田大作著，荀春生、朱继征、陈国梁译）

从世界范围来看，文明的发展，也常常以文化的复兴为先导。在近代产生的西方文明中，欧洲“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就起了巨大作用。“文艺复兴”推动欧洲从中世纪的黑暗走出来；“启蒙运动”积极改造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先进思想，使“自由”、“平等”、“民主”、

“公正”等观念深入人心。“文艺复兴”还被恩格斯称为“一次人类从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那个时代的天才之思想也正是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传统中启发的，其中的源头又在于古希腊、古罗马典籍的发现和整理。20世纪40年代末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斯的《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提出，人类有个“轴心时代”，就是释迦牟尼佛、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他说：“人类一直靠轴心时代所产生的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时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归，或者说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的动力。”那么，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要从“轴心时代”的圣人那里、从历代圣贤的经典之作中受到启发，找到真正的切入点和精神的动力。

事实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也正在于圣贤。自上古开始，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诸多圣贤。他们的思想、他们的道德、他们的智慧，影响和塑造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成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它与那些标新立异、争奇求怪、哗众取宠的实用学、关系学、成功学、阴谋学、厚黑学（李宗吾本意是用来利公，却没有做到隐恶扬善，导致很多人却学会了用来营私，变成了表面仁义道德、实则穿窬之盗）有极大的不同，与“复制文化”、“享乐文化”、“快餐文化”、“低俗文化”、“功利文化”（明代思想家王阳明在《传习录》“答顾东桥书”中指出“圣人的学问，越来越昏暗不明；功利的习气，越来越严重。到现在，追求功名利禄的流毒侵蚀人们的灵魂，积习成性，已达数千年。人们在知识上彼此夸耀，在权势上彼此倾轧，在利益上彼此争夺，在技能上彼此攀比，在名声上彼此竞争”）也有天壤之别。它最本质的特征，在于将人性中善的一面激发出来，而抑制恶的一面。几千年来，人类的文明虽然经历了农耕文明、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变化，生活方式经历了由步行、坐船、坐马车到坐汽车、坐火车、坐飞机，由书信、当面晤谈到电话、手机、微博、微信等交谈，资讯获取由读万卷书、行千里路、会百个友到点击互联网，购物或交易由实体商务到电子商务等诸多变化，制度演进经历了由帝制到君主立宪制、民主共和制等多种变化，但惟一没有变的乃是人性、人欲。而圣贤之学不仅是对治人性、人欲的良药，而且包含了很多修身养性、治国理政的智慧，

我们应永远铭记中华圣贤的教诲！

那么，我们的中华圣贤有哪些呢？在《汉书·古今人表》中，东汉史学家班固将中国汉代以前的人物分为“上上圣人、上中仁人、上下智人、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愚人”九等。其中大家所熟知的，上上的圣人有伏羲、炎帝、黄帝、尧、舜、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公、孔子。上中的仁人有女娲、赤松子、伯益、伊尹、盘庚、武丁、傅说、泰伯、仲雍、微子、箕子、比干、伯夷、叔齐、吕尚、周成王、召公、管仲、宁武子、季札、子产、晏婴、左丘明、颜回、子思、孟子、屈原、鲁仲连、蔺相如、荀子等。班固列举的这些先秦的圣人、仁人也可以说是我们所讲的圣贤。当然，中华圣贤远不止这些。

大家都知道，圣贤尤其是圣人，对一个人、对一个民族、对一个国家乃至对整个世界的影响是长期久远的，是超时空的。孟子说：“圣人，百世之师也。”（《孟子·尽心下》）民国伦理学教授杨昌济先生曾提出“天子一代帝王，圣人百代帝王”（《达化斋日记》）的观点，就是说天子无论怎么强大，也只能建功业于当代，死后则如过眼云烟。而圣人的思想和精神却永垂不朽，可历百代而不忘。功业留给人们的是回忆，并在岁月中渐渐被淡化，直至完全消失，而思想和精神一旦被人们认可便能不朽，并在某种程度上支配着人们的行为。所以说，帝王统治人们不过一朝一代而已，而圣人却能穿越时空延至几千年或更远，并起着影响世界、改变世界和塑造世界的作用，而且常常是“百姓日用而不知”（《易经·系辞上》）。

正如圣贤不是标榜出来的一样，圣贤之学不是空泛的，而是通过具体的言行展现出来的，他们“动而世为天下道，行而世为天下法，言而世为天下则”（《中庸》）。可以说，圣贤的言行体现了中华文化大智慧，本书之所以取名《中华文化大智慧》也正在于此。圣贤之学是世界光芒、指路明灯、人类荣耀；是我们渴时的甘露、饥时的食粮、冷时的暖衣；是我们疲惫心灵的接引，是我们日常生活的导引，是我们修身养性的指引，我们应当好好学习。《礼记·学记》中说：“建国君民，教学为先”。那么从哪里教育起，从哪里学习起？就从历代圣贤的言行教起、学起。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准则和生活方式。我们坚信，只要我们人人能够添砖加瓦、薪尽火传，中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将大行于天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将实现！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中华文化大智慧，特别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圣贤之学，是我们每个中华儿女的重大使命。鉴于几千年来的中华圣贤不少，传世的言行也很多，加之记载中华圣贤言行的历代典籍浩繁，因此集其精要并进行解读阐释而成书。《汉书·艺文志》中说：“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唐代名臣魏徵在《群书治要序》中讲到：“左史右史记事记言，皆所以昭德塞违，劝善惩恶。”本书也分两篇，一是嘉言篇（三十二讲），一是善行篇（三十三讲），均以时间为顺序、以经史为内容，贯穿人物和事件，每一讲皆单独成篇。虽不敢望《尚书》、《春秋》之项背，但最主要目的也正在于“劝善惩恶”，以挽世道人心，并为志在圣贤者提供镜鉴。

限于学识，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欢迎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谨识

二〇一四年六月

目 录

第一讲 尧舜禅让 / 1

• 尧禅让于舜，大致经历了五个步骤：一是选于民，二是察于行，三是摄于事，四是荐于天，五是决于民。舜禅让禹也是如此。这五个步骤，实际上并不逊于我们现代的民主政治。从“选于民”开始到最后“决于民”，充分体现了民主。而且中间还有严格的考察和试用期，更有宗教意义上的仪式。

• 荐于天是上古时期禅让中的关键性步骤。只有上天同意了，才可以当天子。这是极具宗教意义的，和中国古代祭祀一样，绝不可武断地说是迷信。只有通过这种仪式，才能是合法的。它最重要的是，说明了天下权力授予的神圣性，约束天子选择接班人必须选择品德优良、才能卓越的人。中国的天，一方面代表上天，另一方面还代表百姓，即“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也只有这样做，才能使继位者有敬畏之心，才能使继位者牢记天赋的使命和对百姓的责任。

• 在古今的政治中，选择最高执政者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君权神授”，偏重于宗教意义；另一种是“君权民授”，偏重于民主意义。尧舜为后人所称道，不仅在于他们的仁德爱民，而且在于他们首创了权力运行中的禅让制，并且将神圣性和民主性有效地结合起来，实现了权力的和平交接（北宋邵雍《伊川击壤集·首尾吟》中讲：“唐虞揖让三杯酒”），堪称古代帝王之典范。

第二讲 尧帝虚心纳谏广开言路 / 9

• 尧帝虚心纳谏、广开言路是通过置谏鼓（在朝廷设置谏鼓，凡想提建议的人就击鼓劝谏）、立谤木（在交通要道上竖立木牌，凡是提意见的人就把意见书写在木板上）实现的。他常常担心自己处理政事有错误，又因为自己位高权重，担心朝廷之中的人不敢当面直言，所以让天下的百姓来直言，因为知政之得失者在于百姓。这等心胸是何等开阔，这也是他之所以成为圣王的一个重要原因。

• 虚心纳谏有三个层次：一个是子路的闻过则喜，一个是太禹的闻善言则拜，一个是舜帝的闻善则共为善（即古代所讲的“与人为善”）。这三个层次，子路之喜，怕自己不善，没能忘掉自己；禹之拜，见善在于别人，没能忘掉别人；舜帝则是人己两忘，善与人同，心胸更加开阔。论境界，舜高于禹，禹高于子路。所以，圣人的心至公至虚，公则无论大小不遗漏，所以取善的途径就非常广；虚则人己两忘，所以取善的心境就更圆融。孟子最赞赏的是舜帝的境界。

第三讲 虞舜孝闻天下 / 16

· 虞舜是因孝闻名天下，并因此被推荐为帝位继承人的。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从平民百姓当上帝王的。孔子对舜的孝行高度称赞，他说：“舜其大孝也与！德为圣人，尊为天子，富有四海之内。宗庙飨之，子孙保之。”实际上，孝道是通行天下的，是跨越时空的，是不分贵贱的，是人类社会的根本准则。所以虞舜之孝行，也是永远被后世所效仿的。孟子简明扼要地归纳为一句：“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

· 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孝是核心内容之一。除了专门以孝命名的《孝经》、《文昌孝经》外，还有《百孝经》。在《百孝经》中，大家要留意这三句话：一是“孝是人道第一步”；二是“自古忠臣多孝子”；三是“诸事不顺因不孝”。另外，很多人都在外忙事业、忙交际、忙工作，总想等到自己成功了才来孝敬父母。但是事业成功又何时有个止境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忘记“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啊！

· 《庄子·天运篇》中讲了五层孝的境界。《安士全书》“劝养亲者”中讲了小孝、中孝、大孝、大孝之大孝四个层次。随着时光的流逝，父母的年龄却越来越大，他们的寿命也在日渐减少，我们要想着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父母脱离生死的困扰，用什么方法可以使父母成为圣人，与圣人为伍，最终修成正果。这种孝就是大孝之大孝。

· 能行孝的人成道最快，也最吉祥。佛家《睽子经》载，佛言：“使我疾成无上真正道者，皆由孝德也。”《四十二章经》中说：“凡人事天地鬼神，不如孝其亲矣，二亲最神也。”《吉祥经》中说：“奉养父母亲，爱护妻与子，从业要无害，是为最吉祥。”

第四讲 舜帝治国以教化为上 / 27

· 《史记·五帝本纪》载，舜帝曾任用高辛氏“八元”布五教于四方，任用契教五伦。《尚书·舜典》也载，舜帝用诗歌和音乐来进行教化。《韩非子》、《吕氏春秋》、《说苑》还载，舜帝对不肯归服的有苗部族，不是动用武力，而是修教化三年，有苗于是归服。在古代，教化不等于教育，因为它是对社会的，而且它是和政治联系在一起的，所以也叫“政教”。另外，教化中很关键的是“化”，就是要把人心化转。

· 北宋史学家司马光认为，教化，是国家最为紧要的事，但平庸的官吏却轻视它；风俗，是天下的大事，但昏庸的君主却忽略它。只有明智的君子深谋远虑，知道它的益处广大，功效深远。他分析，东汉自和帝以来，社会黑暗，但汉朝并没有灭亡，还一直延续到汉献帝，就连曹操也始终不敢称帝，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光武帝、明帝、章帝传留下的教化，使百姓仍是向往汉室的。（《资治通鉴·汉纪六十》）

· 自古及今，一个政权想永久长存是很难的。有时越想控制越控制不住，特别是用暴力来控制，反而会适得其反。所以，最首要的是教化。只有教化的成功才是最大的成功。舜帝之所以是圣人，就在于他不拘一时的得失，而是用其教化得人心，这样才是真正的长久之计，也只有这样才能国泰民安、天下皆服。

第五讲 大禹治水 / 35

• 大禹治水最大的好处是使百姓有生存之地，可以安居乐业，且四海之内都可传播德教。另外，大禹治水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就是我们中华文化讲的“天地人”三才之道是在大禹时才完备的。尧帝在位时，顺应上天，制定历法，让百姓使用，这是讲“天道”；舜帝在位时，非常重视推行教化，建立人伦道德，这是讲“人道”；而大禹治水，使土地得到平治，让百姓有安居之所，这是讲“地道”。

• 从大禹治水开始一直到今天，历史上几乎没有间断过兴水利、除水害。最值得大家注意的是，《汉书·沟洫志》中所载的贾让“治河三策”，简言之就是“疏、浚、塞”三字。第一就是“疏”，也即导引。大禹治水就是用此方法，顺水之性（即润下之性），因水之流，使大江大河之水最终流向大海，而千载无患，一劳永逸。这是最上之策。第二是“浚”，也即挖深河道，穿漕引渠，分水流通。如挖渠就可分水引流，而且还有三利，一利灌溉，二利淤肥，三利行船。这种方法也可兴利除害，可延续百年。这是中策。第三是“塞”，也即堵塞。主要是造堤筑坝，但这个花费最多，而且一旦水大也很难固堤。所以这是最下之策。

• 《易经·系辞上》中说：“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也就是说，所做的事情能惠及天下百姓的，就叫做事业。2005年9月28日，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在对来自全国各地的工商界成功人士发表的演讲中指出：“一个人一生里做一件事情，对世界人类永远有功劳，永远有利益给大家，这个才叫事业。像大禹治水，这叫事业，因此他为万世所崇仰，其功永不可没。上面最高到皇帝，下面最倒霉到讨饭的，都不是事业，那是职业。在座的工商界老板生意做得很好，赚钱很多，要讲事业那还差得很远。”

第六讲 大禹惜寸阴 / 44

• 晋朝皇甫谧《帝王世纪·第三·夏》载，大禹“继鲧治水，乃劳身涉勤，不重径尺之璧而爱日之寸阴”。《晋书·陶侃传》载，陶侃说：“大禹圣者，乃惜寸阴；至于众人，乃惜分阴，岂可逸游荒醉？生无益于时，死无闻于后，是自弃也。”这都是讲大禹珍惜时间是用寸阴来衡量的。

• 天下有两样东西是最公平的，无论是对帝王将相，还是对平民百姓，不分种族，不分性别，皆是如此。一个是死亡，无论是谁都逃脱不了。另一个就是时间。它不会给谁多一些，也不会给谁少一些。

• 时间是非常伟大的。首先，时间是最伟大的终结者，世间的人或事最后都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终结；其次，时间是最伟大的评价者，经典之作和人之品德只有经过时间的淘洗才会呈现出来；再次，时间是最伟大的治疗者，一切爱恨情仇、悲伤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都会逐渐淡化甚至被遗忘。

• 美国夏威夷岛上学生上课前有个著名的祈祷词：“一个人的一生只有三天——昨

天、今天和明天。昨天已经过去，永不复返；今天已经和你在一起，但很快也会过去；明天就要到来，但也会消逝。抓紧时间吧，一生只有三天。”另外，我们要特别重视业余时间，爱因斯坦曾经说：“人的差别就在于业余时间。”

·《佛说四十二章经》中讲，人的生命只在一呼一吸之间。当我们感受到这种生命之无常时，一定要像大禹那样珍惜时间，将身心投入到对整个人类有意义的事情上。实际上，人生的全部学问就在于和时间打交道。明朝王道焜《书屏语》说得很好：“人于一日间，或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行一善事，此日方不虚过。”清朝金缨《格言联璧·持躬类》中讲：“此生不学一可惜，此日闲过二可惜，此身一败三可惜”。

第七讲 禹汤罪己 / 54

·禹汤罪己，说的是大禹和商汤主动承担过错、反省修正行为之事。出自《左传·庄公十一年》：“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大禹出巡遇见一个犯罪的人归过于己而哭泣，体现了罪己的精神。商汤罪己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即“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从古今中外历史来看，人类最为宝贵的经验、不断走向文明的宝训，就是这五个字：“人会犯错误。”禹汤罪己的行为，正是我们人类非常可贵的风范。

·人不是神，有着诸多不足，但是人之所以为万物之灵，就在于人还有罪己悔过之心。明朝学者洪应明《菜根谭》中说：“盖世奇功，当不得一个矜字；弥天大错，抵不过一个悔字。”一个犯了过错的人只要肯悔过，就还有得救。

·主动承认过错、深刻反省自我的“罪己”精神意义非凡：第一，罪己是避免危亡的重要举措。像汉武帝晚年颁布“轮台罪己诏”，挽救了当时的危局，避免重蹈秦亡之覆辙。第二，罪己是迈向救赎的重要起步。像德国总理维利·勃兰特因二战中德国纳粹犯下的罪行，在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前双膝下跪并为苦难的灵魂祈祷，这种迈向救赎的罪己之心，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第三，罪己是忏悔行为的重要内容。在佛教中有著名的《礼佛大忏悔文》，如果没有罪己的忏，就难以有效果。

·西方有三大《忏悔录》，第一个是古罗马哲学家圣·奥古斯丁的《忏悔录》，第二个是法国思想家卢梭的《忏悔录》，第三个是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的《忏悔录》。世人对这三大《忏悔录》之所以评价甚高，也正在于其罪己和忏悔之真诚。

第八讲 汤武革命 / 63

·汤武革命，是指商汤以武力推翻夏桀，周武王以武力推翻商纣，以救民于水火的正义行为。《易经·革卦》中讲：“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孙中山先生特别盛赞革命，他在《革命运动概要》中说：“革命名字，创于孔子。中国历史，汤武之后，革命之事实，已数见不鲜矣！”他曾于1910年2月28日在旧金山丽蝉戏院的演说中说：“革命者乃神圣之事业、天赋之人权，而最美之名辞也！”

· 在中国古代，如果帝王不贤能，又暴虐，弄得百姓日子不好过，而他又不可能让贤，如何实现纠错呢？其途径有三种：一种由大臣致其悔改，如商朝伊尹放太甲；一种由大臣行废立之事，如西汉霍光废昌邑王；一种由大臣或百姓起来用武力革命，如汤武革命。前两种并没有动摇根本，而第三种则是彻底改朝换代。

· 辛亥革命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帝制，使民主共和的观念深入人心。新民主主义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它推翻了压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使贫苦百姓翻身做了主人。这两次革命是中国近代以来最伟大的革命。

· 在西方历史上，最有名的莫过于近代英、美、法等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特别是美国革命中的《独立宣言》，马克思称之为“第一个人权宣言”。《独立宣言》写道：“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为了保障这些权利，人民才在他们中间成立政府，而政府的正当权力，则是经被统治者同意而取得的。任何形式的政府一旦对这些目标的实现起破坏作用时，人民就有权加以变更或废除，以建立一个新的政府。”这个宣言的重大意义在于直接赋予了人民革命的权利。

· 虽然革命或改革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也要审慎地对待。清朝康熙三十二年（公元1693年）钦定的《日讲易经解义》讲“革卦”时说：“革之道关乎治乱安危，非圣人之得已也。后世之患，不失于因循以养祸，则失于轻作以败事。故当革而不革，法久则弊生，不可也；不当革而革，兴一利必生一弊，尤不可也。”中国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比如晚清自“戊戌变法”后，自身的变革太慢，当变革而不变革，最后自己被革命而灭亡。又如“王安石变法”，有些地方不应当变革而变革，导致兴一利又生一弊，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多少好处，加上用人失误，最后变革失败。

第九讲 周文王泽及枯骨天下归心 / 76

· 周文王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圣王，他对《易经》的发展起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对中华文化的贡献功不可没。《易经》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也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古代，《易经》是思想家、学问家、政治家、军事家必修科目，被称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

· 周文王泽及枯骨的主要意义有三个方面：一是体现了“四海一家”的情怀，也就是说无论这枯骨来自何方，只要在当时的周国，那就应当被视作周朝的百姓而同等对待。二是体现了“民胞物与”的情怀。枯骨实际上已经不是生命了，但它曾经是一个人。在周文王眼里，无论是有情还是无情，都应当爱护。三是体现了“同体大悲”的情怀。佛家讲“同体大悲”就是观一切众生与自己同体，众生的痛苦就是自己的痛苦。周文王看到枯骨非常悲痛，人的生命已不在了，所以要善待他的尸骨。

· 一个人的心量决定了他的容量，也即人们常说的“心有多大，世界就有多大”，

“境界决定世界，格局决定结局，态度决定高度”。心量大的人，无论是人，还是物，甚至是敌人，他都能慈悲以对，这样的人就会得到大家的拥护。一个人的包容性有多强，他的力量就有多强。能包容天下的人，天下的人、天下的物都是他的兄弟姐妹，因此他能化敌人为亲人，化无情为有情，这都是源于慈悲的心量。

第十讲 伯夷、叔齐高洁 / 81

· 伯夷、叔齐在中国历史上是有名的高洁之士，其行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一种性格特质——隐逸。司马迁说：“末世争利，维彼奔义；让国饿死，天下称之。作伯夷列传一。”（《史记·太史公自序》）就是说，在末世的时候，大家都在争利，只有他们奔向义，让国王之位并且义不食周粟而饿死，天下都称赞。孔子多次称扬伯夷、叔齐，孟子更称赞伯夷是圣人，是“百世之师”，并且说“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唐朝文学家韩愈《伯夷颂》也称赞伯夷的“特立独行”。

· 孔子曾说过“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就是讲，天下政治清明的时候，就出来施展自己的抱负，发挥自己的作用；天下政治黑暗的时候，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就辞职隐退。像孔子的“道隐”、庄子的“心隐”、西汉东方朔的“朝隐”及唐朝白居易的“中隐”等，都是因为条件不允许“兼善天下”，只能“独善其身”。

· 人总是要有点品行的。每个人来世一遭，要想不留下污点，就必须追求高洁的品行。没有高洁品行做保证，我们做事就会立不住。古代伯夷、叔齐两兄弟谦让并放弃国君之位、反对以暴易暴、不食周朝之粟之高洁品行，非常值得我们尊重。就整个社会来说，这是有着非常重要意义的。试想，如果整个社会的人都不顾一切追求权力、财富、物欲，目的只为了己一家，那么这个社会该是多么可怕啊！所以，这两位圣贤的行为对汲汲于名利、丧失廉耻者有极大之教化作用。

第十一讲 周公禁酒 / 89

· 一提起酒，很多人都知道中国有很悠久的酒文化。虽然，我们中国制造酒的历史非常悠久，但是我们中华传统文化实际上并不鼓励饮酒，反而提倡限制饮酒，甚至禁酒，只在祭祀或行敬老之礼时才能适度地饮酒。在中国历史上，周公是第一个颁布禁酒令的人。周公颁布禁酒令，对于树立良好的政风、民风，提高官员和百姓的德行修养起到了很大作用。实际上，我们中国的酒文化就是两个字——敬酒，而敬酒就是敬献天地和祖宗，就是对酒敬而远之，同时也是“禁酒”。

· 酒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津津乐道的饮料，与文人雅士有关。像西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还专门写过《酒德颂》。不过刘伶是借颂酒之德来歌颂道家的无思无虑和毫无私利之心。又如汉代“高阳酒徒”酈食其及晋朝的阮籍、陶渊明都是十分好酒之人，曹操的《短歌行》一诗中还说：“何以解忧，惟有杜康。”唐代“诗仙”李白更是与酒分不开，最有名的是他的《将进酒》。在西方还有个有名的“酒神哲学”，是德国哲学

家尼采提出的，它实质上是通过艺术来拯救人生悲剧、肯定生命。

· 饮酒容易导致以下五个方面的害处：第一，酒可损身。人性有个弱点，容易贪杯，这样就伤身。如皮日休《李翰林诗》讲李白“醉致疾亡”。第二，酒可误事。如晋楚鄢陵之战中，楚国的司马子反因手下人献酒给他而喝醉，最后导致楚军撤回国。第三，酒可惹祸。如西汉时的灌夫喝酒骂座，得罪田蚡而被杀。第四，酒可乱性。如历史上“绝缨之宴”中的那位臣子就是。男女都要警惕酒后乱性。第五，酒可昏德。如夏桀和商纣就是如此。

· 在中国，大禹是史书记载的意识到饮酒危害性的第一人，他在位时，仪狄酿造了一种酒，大禹喝了以后感到特别甘美，可事后却疏远了仪狄，绝口不再喝这种美味的酒，他预言说：“后代必定会有因嗜酒而亡国的君主。”他这个预言果然正确，其后的夏桀和商纣皆是因嗜酒而亡国。道教、佛教均将“不饮酒”作为五大根本戒之一。佛教还多次提到饮酒的危害，如《中阿含经·卷三十三·善生经》中讲饮酒放逸有六灾患。

第十二讲 周公诫无逸 / 98

· 人性都有一个弱点，就是好逸恶劳。自古以来，有国有家者都是因为勤劳而兴旺，因为安逸而衰败。普通人好逸恶劳，不过导致一己一家之衰败，而执政者贪图安逸，则关系一国之安危，因此贪图安逸实为执政者之大戒。三千多年前，周公告诫其侄子周成王，专门作了《无逸》，成为后世著名的训则。在中国历史上，与“周公诫无逸”的道理类似的还有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和欧阳修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

· 在《尚书·无逸》中，周公提出了“无逸可以享国长久，逸乐则享国短暂”的历史经验教训。他指出，无逸的如殷王中宗享有王位七十五年，殷王高宗享有王位五十九年，殷王祖甲享有王位三十三年。自此以后所立之王，生来就舒适安逸，不了解稼穡之难，不了解民众劳苦，就没有能在位长久的，长的不过十年，短的三四年。

· 《左传·闵公元年》载，管仲说：“宴安鸩毒，不可怀也。”意思是，以安逸为乐，这比鸩鸟还毒，不可怀有这个想法。“温水煮青蛙”也说明，在一个安逸的环境中，人很容易失去应有的警惕，往往因为懈怠而导致自身的毁灭。古代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还指出：“安逸的国家养育的毫无例外是柔弱的人民。”因此，《易经·乾卦》中讲：“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后人简化为“朝乾夕惕”四个字，即早晨要自强不息，晚上要警惕反省。这也是“无逸”的功夫。

· 历史上一些王朝兴衰常有这样的规律，建国之始，帝王们深知江山得来不易，都励精图治，因此国家容易兴旺；而到了社会安定、百姓富足的所谓盛世，往往就开始贪图享受，国家也就走下坡路了。法国政治思想家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指出，不惜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

如果成为所有阶级最普遍的感情，那么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所以，我们要牢记周公诫无逸的训则，只有这样，才能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

第十三讲 召公以贤为宝 / 105

·《尚书·旅獒》载，西周初年的太保召公告诫武王“玩人丧德，玩物丧志”，并特别提到“所宝惟贤，则迩人安”。凡是历史上以贤为宝、重用贤人的时期，国家往往迅速昌盛；凡是历史上以宝玉为宝、以尤物为宝的时期，国家往往迅速衰败。孟子曾特别告诫“宝珠玉者，殃必及身”。

·贤人在国家治理中有非常大的作用：第一，重用贤人可垂拱而治。尧舜垂拱无为而天下治就是因为他们能求得贤人辅佐。第二，重用贤人可成就大业。《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说：“秦穆公亲自把百里奚从拘囚中选拔出来，和他交谈三天就把国政交给了他。用这样的办法治理天下，即使成就王业也是可以的，成就霸业算是小的。”第三，重用贤人可使民心服。《论语·为政》载，孔子说：“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无论在什么时代，无论在什么制度下，都只有重用贤德的人，国家才能得到大治。《中庸》载，孔子说：“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故为政在于得人。”他特别提出了“为政在于得人”。如果没有贤人，制度再好也可能是一纸空文。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中指出，“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在这个使用干部的问题上，我们民族历史中从来就有两个对立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贤’的路线，一个是‘任人唯亲’的路线。前者是正派的路线，后者是不正派的路线”。

第十四讲 楚庄王崇尚武德不筑京观 / 111

·《左传·宣公十二年》载，在楚晋邲之战中，楚国获得胜利，大臣潘党建议楚庄王修筑京观，作为纪念物使子孙知道，以不忘武功。楚庄王不同意，他说“止戈为武”（即停止干戈是武），并说武是用来禁止暴力、消除战争、保持强大、建立功业、安定百姓、和睦大众、丰厚财富的。这体现了他对武德独到而高远的见解。孔子曾称赞他不贪求土地而恢复陈国之举，说：“贤哉楚庄王！”（《史记·陈杞世家》）

·用武的首要目的是为了“禁暴救乱”，这也是判断战争正义与否的标准。像商汤、周武王的“仁义之师”就是。用武也是为了停止战争、消除战争，最终是为了和平。《司马法·仁本第一》中讲：“以战止战，虽战可也。”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更明确提出“为永久和平而战”的观点。像以“止戈为武”、“以战止战”、“为永久和平而战”这些观点在人类历史上都具有超时空的意义。

·用武是为了禁暴除害，为了停止战争，同时也要爱护百姓。战争时，要对百姓秋毫无犯。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三》载，东汉末年，孙策渡过长江向南发展，他

的军队严守纪律，不敢抢掠，百姓非常高兴，争先慰劳军队；曾国藩与太平天国作战时，也有一个著名的《爱民歌》；毛泽东曾制定“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战争结束后，首要的也是要让百姓安定，休养生息，像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及印度的阿育王都是如此。

第十五讲 樊姬贤明兴楚 / 120

- 樊姬是楚庄王的夫人，非常贤明，不仅自身有很好的修为，而且还辅助楚庄王兴楚，使楚国强大起来。西汉经学家、文学家刘向《列女传》中讲，楚国的史书记载“庄王之霸，樊姬之力也”。也就是说，楚庄王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之一，很大程度上得力于樊姬。

- 在中国历史上，贤明的帝王背后，大多会有一个贤明的皇后。如舜帝的二妃娥皇、女英；周朝的太姜、太任、太姒（“太太”一词由来即在于此）；周宣王的皇后姜氏；齐宣王的王后钟离春；汉光武帝的皇后阴丽华；汉明帝的皇后马氏；唐太宗的皇后长孙氏；宋仁宗的皇后曹氏；明太祖的皇后马氏；明成祖的皇后徐氏；等等。

- 《中庸》讲：“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意思是，君子之道是从夫妇开始的，到其极处，便可体察天地之道。实际上，夫妇是一小天地，天地是一大夫妇。《易经》中有一个卦叫“家人卦”，与“夫妇之道”密切相关。这个卦讲“家人，利女贞”，这告诉我们，自古家道的成败，无不从妇人开始。

- 男女夫妇之道是人类文明最基本之道，值得每个人重视。在一个家庭内部，女人的地位又是居于核心的，她的品德直接关系到家庭的兴衰。近代民间教育家王凤仪曾说，“女人有三妇：悍妇、弱妇、媳妇”，“悍妇和弱妇都不是媳妇。媳妇的意思是平息一家的不和，做和睦一家的吉祥使者，对人人平等、和气，齐满一家的福气”。所以，当媳妇的做一个王老善人所说的“媳妇”，像春秋时的樊姬那样贤明，就会兴家乃至兴国。

第十六讲 延陵季子挂剑重信三让王位 / 130

- 讲信用是有境界的。第一层境界是不欺言。因为对他人有所承诺，所以就有个约束力，一般来说还容易做到。第二层境界是不欺行。比如明确规定自己每天有什么行动，虽与他人无关，但别人可能知道，也会有一定的约束力，如果做到了，就是不欺行。第三层境界是不欺心。自己内心已有承诺，但他人不知道，完全没有约束力，在这种情况下，依然不违背自己的内心而履行信义。延陵季子“挂剑重信”，就是不欺心，代表了信用的最高境界，可谓“中华诚信第一人”。

- 一个人可以做到绝色美女面前不动心，可以做到亿万金钱面前不动心，甚至可以做到将相权位面前不动心，但是在王位面前不动心的古今来没有几个，因为有了王位就基本上什么都有了。而延陵季子“三让王位”，对王位不动心，确实世所罕有。所

以孔子称：“延陵季子，其天民乎？”将他比作是天上的人。

第十七讲 孔子作《春秋》 / 137

·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说：“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所以，史是中正之道。孔子作《春秋》是中国历史上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开创了以历史来评判行为的先河，其所作的《春秋》被宋朝史学家胡安国誉为“传心要典”。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有国者不可以不知《春秋》。”

· 孔子作《春秋》，大约有以下三种原因：一是为了给后世留下好名声。孔子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于是根据史书记载而作《春秋》。二是为了彰显王道大法。孔子之所以被称为“素王”，正在于他作《春秋》为后世王者立法。三是为了使乱臣贼子有所畏惧。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而孔子作《春秋》是以“微言大义”的形式来体现的。《史记·孔子世家》还说，孔子作《春秋》，就连子夏这些长于文字的弟子，都一句话也不能给他增删。这就是著名的“春秋笔法”。

· 由于孔子作《春秋》立下了褒善贬恶标准，所以，我们中华民族是正邪分辨、忠奸分明、善恶分开的。谁正、谁邪，谁好、谁坏，谁忠、谁奸，都在百姓心中。这也是我们中华民族一大优秀传统。孔子所作的《春秋》还是万世权衡之典，在中国历史上有个著名的“春秋决狱”，就是用《春秋》经义作为司法中断案的标准。

· 人活在世上，必须有所敬畏，才不敢肆意妄为。像《春秋》等史书让人敬畏，起了“准宗教”的作用，它让所有的人都有一个礼义善恶的标准，明白什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是在道德、法律之外的第三种制约力量。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一文中指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因此，我们要学好中华民族的历史，成为知道敬畏、为善去恶、深具智慧之人。

第十八讲 宓子贱治理单父民不忍欺 / 148

· 治理是世界上所有政府面临的一个共同课题。能否让国家长治久安、让社会和谐稳定、让百姓善良幸福，是考量治理智慧的根本所在。中华民族早在几千年前就形成了一套治理体系，早在春秋时期就有“民不忍欺（德治）、民不能欺（察治）、民不敢欺（威治）”三种层次的治理。其中，孔子的弟子宓子贱治理单父（今山东单县）以德化民而民不忍欺，为我们立足中华民族特性、提升治理水平指出了一个好的方向。

· 民不忍欺实质上体现的是德治。这种治理，注重的是教化、风俗和尊贤。这是从人的内心去改变一个人，让人受到感化，变成善良之人。这样治理下的百姓做任何事，都会从内心的良知出发。所以，这也是孔子所说的“仁者安仁”（《论语·里仁》）。英国小说家菲尔丁曾说：“纵使在一个法纪最松弛的国家里，一个品德高尚的人